

《洛阳伽蓝记》的叙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探究

刘禹辰

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

【摘要】：《洛阳伽蓝记》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以城市建筑、佛寺营建和都城风貌为核心的地理史料专著，由杨衒之於东魏武定5年（547）撰写所成，其背后揭示了北魏历史的变迁。该书以佛寺为叙事刚维，但同时又展现了北魏的历史变迁、政治文化、社会风俗和人物事迹，兼具着佛教史籍、地理志和文学名著的多重属性。通过《洛阳伽蓝记》既能了解北魏崇佛、尚奢的风气，也能了解官员和百姓之间的交通往来、信息沟通，是当代了解北魏历史的重要门径。本文将从《洛阳伽蓝记》的叙事特征和文化内涵角度对其展开梳理和分析，阐述该书的文献价值、佛教文化和文学意蕴，以探究其作为中国都市文学典范的独特意义。

【关键词】：《洛阳伽蓝记》；北魏；叙事特征；文献价值；文学意蕴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6.11.046

1 引言

公元495年，魏孝文帝定都洛阳，其后洛阳城及周边开始兴建大量寺院，其兴盛程度难以为后人所想象。然而，在公元534年，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，分别定都于邺城和长安，因而昔日繁华的洛阳逐渐沦为废墟。公元547年，时任抚军司马的杨炫之重游洛阳，通过对北魏分裂前佛寺盛景进行追记，撰写了集历史、地理、佛教、文学于一身的《洛阳伽蓝记》^[1]。

《洛阳伽蓝记》全书共有5卷，主要记载了洛阳城内外的43座寺院，以及围绕寺院所发生的史实。杨衒之在《序》中写道“恐后世无闻，故撰斯记”，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佛教兴衰进行记载和历史追问，来思考社会乱治之道。《洛阳伽蓝记》在时空交织的网状结构中融注了历史悲情，开创了中古都市记体文学的新范式，特别是其“自注”体例体现了作者对叙事文本的内在介入，且兼具史家实录精神与文学抒情品格，可将其作为了解北魏社会变迁与文化风貌的核心文献。通过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叙事特征和文化内涵进行分析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古文献的多维价值，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2 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进程概述

《洛阳伽蓝记》以旧都洛阳佛寺为纲，记载了八十余处佛寺及宫殿、园林、人物轶事和志怪传说，被誉为北魏洛阳的“百科全书”。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有两个重要转折点，即明代和近代。在明代以前，针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寥寥无几，而所存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校勘，而并未对该书的文学价值、佛教文化等内容进行深刻的研究和阐述^[2]。自明朝起往后，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逐渐增多，且除了校勘之外，也更加注重注释。直至近代及其以后，在以往校勘和注释的基础上，开始从文史、建筑、史地等角度对《洛阳伽蓝记》展开研究，极大地丰富了该书的研究视角。

2.1 明清时期

明清时期属于《洛阳伽蓝记》系统研究的奠基阶段，《四库提要》据刘知幾论断，“则衒之此记，实有自注，世所行本皆无之，不知何时佚脱。”同时，顾广圻根据刘知幾的论断推出书原“用大小字分别书之”，今传诸本因“混注入正文”致“一概连写”^[3]。另外，吴若准还专为《洛阳伽蓝记》撰写《洛阳伽蓝记集证》，此为首次区分正文与子注，随后由张宗祥、唐晏、周延年、范祥雍等学者开创了现代学术整理版本的先例。周祖谟按照次路路径，提出了“凡记伽蓝者为正文，涉及官署者为注文”“其所载时人之事迹与民间故事，及有衒之案语者，亦为注文”的划分标准，时至今日仍为通行。

2.2 20世纪后

自20世纪以来，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开始逐渐转向文本笺注、文体特征、史学价值、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，且研究成果丰富。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除校勘、体例等基础研究外，更侧重综合考察作者、思想、建筑美学等各方面价值，同时对作者姓氏、历官、全书文本与体例的进行了整理、修订，形成了规范版本，且在字词注释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。现代近15年以来，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也持续取得了进步，且所获成果十分可观。比如，在挖掘《洛阳伽蓝记》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等研究中，无论是以《洛阳伽蓝记》为直接对象，还是将其作为依据材料，其研究都取得了更多的新进展。基于现有研究，在作者生平、成书以及文学、史学、文学化学等价值的挖掘尚待持续深入，且还需加深对该书在佛学、民俗学、建筑美学等领域的研究。

总体而言，当前我国对《洛阳伽蓝记》的研究主要以文献整理、历史考证和多维度阐释主要格局，但对该书的文学、史学、民俗学、建筑美学等价值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深。随着

《洛阳伽蓝记》影响力的逐渐提升,国外汉学界也开始加强了对该书的重视,当前已有诸多外译本。

3 《洛阳伽蓝记》的文献价值

《洛阳伽蓝记》从以往版本校勘、注释的研究,已经逐渐扩展为社会文化史、建筑美学、佛教文化等多维度研究,而且还从叙事学、空间理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,而在空间叙述中还融入了时间叙述,形成了时空交错的叙事框架,其文献价值也逐渐得到提升。

3.1 史学价值

《洛阳伽蓝记》共5卷,记载了洛阳八十余所寺庙的方位、兴废,以及宫廷变乱、诸王废立等史事,其内容广博、取材真实、涵盖范围大,可将其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文献,也是正史研究的重要补充^[4]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以北魏洛阳佛寺兴废为主题,既能了解北魏佛教史、社会政治史,也能够从中窥见当时的社会生活。例如,该书卷五《宋云行记》,主要研究了6世纪初期,中亚交通及中国与印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文化交流情况,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。在社会文化史方面,该书也是当前研究六世纪北朝城市经济地理、社会结构的重要史料。

3.2 地理价值

《洛阳伽蓝记》按照空间顺序叙事,先城内,依此为城东、城蓝、城西、城北,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,还兼顾了里巷、方位和各大名胜古迹。从书中可以了解佛寺、都城洛阳的建制、里坊街道都有详细描述。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洛阳的历史地理、考古发掘乃至现代化城市建设,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

3.3 艺术价值

《洛阳伽蓝记》也属于写景文,将荒败、倾圮的城市作为核心意象,来表达对昔日繁华洛阳的追怀,以及对历史变迁的感受,具有独特的审美创作价值。同时,该书融合了北魏时期的城市、艺术与文化等维度的多元审美观念,生动体现了北魏洛阳作为都城的生存状态,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史料。同时,书中所描写的北魏洛阳代表性的寺院,还能展现了早期佛寺建筑在中国的变迁历史。

3.4 中外交通史料

在《洛阳伽蓝记》卷五中,记载了宋云、惠生西行的相关事迹,其可作为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献。同时,有学者指出,“中外学者惯以《宋云行记》指称第五卷,实际上《惠生行记》才是更确切的称谓”。不仅如此,《洛阳伽蓝记》对洛阳居住的外国商人、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等也都有所涉及,可从中了解中外文化交流情况,为相关研究提供史料。

总而言之,《洛阳伽蓝记》在史料补缺方面的价值是其主要价值,能够填补北魏迁都洛阳后的正史漏缺,辅助正史展现北魏社会文化生活,同时也是北魏建筑史与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。

4 《洛阳伽蓝记》的文学意蕴

《洛阳伽蓝记》以空间和时间为经纬,构成了时空交织的网状叙事结构,呈现出了立体式的洛阳城市生活画卷。在语言风格上、叙事笔法上,《洛阳伽蓝记》都有其重要的启示作用,使其超越了地理志或佛寺志的原本内涵,成为中国都市文学的经典。

4.1 叙事结构

在叙事结构方面,《洛阳伽蓝记》具有鲜明的空间化特征。作者在编撰此书时,将洛阳城空间结构作为写作的出发点,并以“大伽蓝”为主题,按城东、城蓝、城西、城北的次序呈现建筑、人物故事等内容^[5]。同时,在描述的过程中,作者还将时间为纬,以“伽蓝”讲述历史事迹,展现了史实、人物、传说及风俗。在著述中,作者在记录寺庙建筑时,笔调客观、冷静,而在叙述历史时,笔调又包含情感。比如,书中涉及蓝朝相关的人事,具有明显的鄙视意味,而涉及北魏灭亡相关的人事,其语句中又饱含悲怆和感伤,促使全书都回荡着悲壮之美的气息。

4.2 文体风格

在学界,《洛阳伽蓝记》的问题风格素有“秾丽秀逸”的形容,这多与作者融汇多种文学传统有关。比如,作者在描写北魏皇家园林时,采用“骋辞铺采”,以四言句式为主,借鉴了京都大赋艺术手法来表现园林之美,“秉承京都大赋的中原正统意识和写法”,具有整饬典丽的特点。全文写作补发骈散相间的散文体式,作者通过将骈文元素与散文写作特点进行融合,如“春风扇扬,花树如锦,晨食蓝馆,夜游后园,僚案成群,俊民满席。丝桐发响,羽觞流行,诗赋并陈,清言乍起。”将两种风格融合,兼具二者之美^[6]。另外,文中志怪笔法也是该书的主要特点。书中在描写与伽蓝相关的神怪故事时,“承续《搜神记》并有所发展,故事情节比较复杂而富有变化,人物形象也刻画得较为丰满生动”,对后世唐传奇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另外,《洛阳伽蓝记》以洛阳佛寺兴衰为全本的主要写作线索,透射了北魏佛教的盛衰轨迹。自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后,因其崇尚佛教,其间佛寺从42所增至1367所,因而有“招提栴比,宝塔骈罗”“金刹与灵台比高,讲殿共阿房等壮”的形容。佛寺修建的壮丽与兴盛,与当时国家腐败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比,使该书具有强烈的反讽张力。

4.3 文化意蕴

《洛阳伽蓝记》的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家国之思上。武定

五年，作者杨衒之重到洛阳，以“城郭崩毁，宫室倾覆”，昔日“招提栴比，宝塔骈罗”的繁华洛阳，已尽是满目凋残的景象。全书以佛寺描述寄托作者的家国之思，其佛寺描写越是壮丽，现实则越是惨烈，更显世事变迁的悲凉和沉痛，且还包含着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”的警示含义。同时，通过对佛教、建筑、人文故事的分析，还可从中了解南北文化的冲突。在《洛阳伽蓝记》中，可以看出当时南北朝对文化正统低位的争夺。作者杨衒之站在洛阳古都地理优势与汉化正统政权的角度，对南方文化则以对立姿态，如南朝相关的物事大都以“吴儿”“伪齐”“伪梁”称之。同时，该书也体现出了文化认同的复杂性，进而催生了北魏这一多民族融合时代的独特产物。杨衒之在书中反复提到洛阳传承汉文化的历史地位，并通过各种文化故事具体展现了北魏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形成的新“汉”文化特点。作者通过“争夺历史解释权”，捍卫北魏汉化成果，也表达了对北朝文化主体性的建构，其主要目的在于确立北朝在文化正统之争中的合法性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林宗毛.屠寄校注《洛阳伽蓝记》廿则的发现与考论[J].2025.
- [2] 张素琴.朝圣与狂欢：《洛阳伽蓝记》所见行像与乐舞百戏[J].北京舞蹈学院学报,2024(5).
- [3] 席格.《洛阳伽蓝记》的“恋地书写”与价值重估[J].中州学刊,2022(6):149-157.
- [4] 王梦琪.浅论《洛阳伽蓝记》的史料价值[J].今古文创,2024(26):88-90.
- [5] 刘跃进.《洛阳伽蓝记》的文献价值及其文学意韵[J].学术界,2023(9):14-28.
- [6] 孙茜.北魏时期的佛寺建筑中国化以《洛阳伽蓝记》为中心的考察[J].中国宗教,2023(1):70-71.

5 结论

《洛阳伽蓝记》集历史、地理、佛教、建筑于一身，在文献价值、佛教文化、文学意蕴方面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，是北朝文学的典范著作。该书记录了北魏佛教的兴盛、佛寺建筑情况，体现了佛教义理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渗透，同时还通过独特的“自注”体例、叙事艺术和文化情怀，为当今的史学、地理、宗教等各个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and 空间。杨衒之在撰写《洛阳伽蓝记》过程中，其内容题材的选择、思想观念等都受到了佛教文化浸染，并在正文叙事中穿插显性的作者声音，以标示作者的在场与感官经验，以其亲历建立文章叙事的可信度，且兼具人文情怀。正是因为这一特点，后世所作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《帝京景物略》等文章，因缺乏人文情怀，其成就难与《伽蓝记》比肩。总而言之，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以伽蓝为写作支点，为后人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政治文化和世俗生活的图景，同时还兼具民族融合、中外交通、建筑美学等研究价值，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。